

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VICTORIA TIN-BOR HUI

[美] 许田波 著

徐进 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海外
译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VICTORIA TIN-BOR HUI

[美] 许田波 著

徐进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美)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著;徐进译. —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SBN 978-7-208-15149-9

I. ①战… II. ①许… ②徐… III. ①中国历史-研

究-春秋战国时代②欧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25.07②K50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694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东方编译所译丛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美]许田波 著

徐进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4

字 数 291,000

版 次 2018年5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49-9/D·3210

定 价 68.00元



译者序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中世纪起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为什么在中国国家权力始终占有绝对优势，社会却极度萎缩，而欧洲国家却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平衡，从而最终发育出公民社会以及宪政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试图通过一个理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来解决这两个未解之谜。¹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认为，支配逻辑(logic of domination)与制衡逻辑(logic of balancing)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相互竞争，其结果既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支配还是制衡：理论与历史的差异

我们首先可以从国际关系层面来探讨国家之间的支配逻辑与制衡逻辑。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当一国实力迅速强大并有觊觎霸权之心后，必然遭到反霸力量的制衡以及不断高涨的扩张成本。一番争斗之后，国际体系将再度回到均势状态。因此，制衡逻辑是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均势状态就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均衡点，任何偏离都导致纠偏力量

的出现。²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似乎认为均势政治是一种普适性的规律,他声称均势政治的存在“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³。均势理论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近现代以来欧美国际关系史的发展,⁴但在解释中国历史时就遇到了问题。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国体系,但奇怪的是,均势逻辑没有在这个多国体系中“扎下根来”,当时的多国体系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归于统一。事实上,华尔兹曾经注意到中国的战国时代,他认为,“国家所处的世界,要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古老……让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例如,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或印度的考提拉时期,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自由竞争,而其本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却没有多大变化”⁵。显然,他在写这段话时没有想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事实是:支配逻辑压倒了制衡逻辑。

怎么解释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差异呢?许田波认为,当争霸国出现时,反霸国(联盟)也随之出现,但称霸和制衡这两股力量谁能最终胜出并不确定,关键要看战争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一场战争来终结多国体系并实现统一。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大国之间有可能爆发上百场战争。一个国家能否在多数战争中获胜、攫取霸权进而统一各国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谋略和实力。

谋略主要用于争取与国、瓦解反霸联盟。争霸国有可能面临强大的反制力量,而反霸国总是面临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欧洲都一样,但中国人却比欧洲人谋高一筹。秦国在崛起、称霸和统一过程中大量使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多次成功地瓦解敌对联盟,同时增加反霸国的集体行动成本,从而在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而欧洲人好像对马基雅弗利的教诲不感兴趣,在谋略方面显得比较“迟钝”。两相比较,中国人在战略思维上明显占有优势。

实力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要素。长期的战争迫使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以提高行政和资源汲取能力,建立切合战争要求的军事制度。在这一点上,中欧走上不同的道路,这种路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秦国实行自强型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极力地扩大国家的行政能力(郡县制)、资源汲取能力(税收全国化)和军事作战能力(普

遍义务兵役制),从而保证为战争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同时还解决了扩张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上升问题。⁶在近代早期欧洲,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实行自弱型权宜措施(*self-weakening expedients*),包括出售公职、借贷和大量使用雇佣兵等措施。这些措施确实能在短期内筹措到必要的资源,而从长期来看却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能有效地支撑长期争霸战争的需求。因此,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都在争霸中失败了。反观英国,由于实行自强型改革,国力迅速上升,最终为其称霸海上、建立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法国直到拿破仑时代才实施自强型改革,而拿破仑亦借此几乎称霸欧陆。但由于改革并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拿破仑亦因此在霸权触手可及之时跌落。⁷

总之,如果一国能像秦国一样将谋略和实力完美地结合起来,那么它就能够摆脱制衡力量的控制,进而统一整个国际体系。至此,称霸与制衡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博弈问题得到解决。下面转入这两种逻辑在比较政治学层面的博弈,其表现就是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与平衡。

国家与社会:另一轮支配与制衡的博弈

如果说某个国家能够摆脱制衡逻辑的困扰,那么它必定有非凡的能力。这种非凡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呢?具体到中国和欧洲,为什么秦国拥有比近代早期欧洲的强国,例如法国、英国或哈布斯堡帝国更强大的国家能力呢?

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社会和个人是三种势力。政府总是希望将社会和个人的权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自己手中,为此,它会压制社会和个人的一切反抗;个人是原子式的单位,无力与政府对抗,他要想保留自己的自由与空间,必须寄望于社会的充分发育;社会是作为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层存在的,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能够有力地抵挡政府力量的无限向下延伸。如果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种势力能够达到并保持一种综合平衡,这就是宪政结构的权力分配实质。因此,宪政的建立有赖于公民

社会的充分发育。⁸许田波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以及宪政结构都有初步的发育，但其后却发生了分道扬镳的现象。⁹中国变成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而欧洲国家却建立了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制度。导致中国和欧洲走上不同国家形成路径的秘密就在于国际战争。上文提到，一个国家要想在长期的国际战争中获胜就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以便政府能够快速有效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源。¹⁰但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与掌握资源的实体——也就是个人和社会——进行多轮博弈和交易。对于政府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实现对个人与社会的绝对统治，即支配逻辑的胜出；对个人来说，他必须利用社会抵制政府的支配行动，所以政府和社会的博弈也就等于支配逻辑和制衡逻辑的较量。

在秦国，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自强型改革使政府力量占据绝对优势。为汲取国内资源，秦国政府通过授田于民、军功封爵、公正司法等措施换取百姓的服从，同时取消贵族阶层的特权，乃至消灭贵族阶层本身，从而为长期执行“耕战”政策打下基础。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在秦统一战国时代的多国体系后，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度失衡导致政府欲望和力量的迅速失控。由于秦廷长时间地、无限制地动员和汲取国内资源，致使行政成本急剧上升。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选择沉默时，武功隆盛的秦朝亦在内外交困中归于覆灭。随后的汉朝吸取秦朝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总的来说，在中国，政府相比于社会更加强大，始终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历代王朝之君惯于用少量经济福利来换取百姓的臣服，而不是像近代欧洲那样给予人民公民权。¹¹

近代早期欧洲的情况正好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相反。由于实行自弱型权宜措施，当时欧洲国家的政府力量相当有限，而社会和个人力量较为强大。为了解决资源匮乏问题，欧洲的君主不得不与中间资源持有者（intermediate resource holders，指银行家、贸易商和雇佣兵头目等）进行交易，以开放政治、经济权利的方式换取进行战争的资源。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双方更多地是以妥协而告终，公民社会和宪政结构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¹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像秦国那样由政府掌握绝对

的政治权力,从而有能力为争霸战争进行长期地、无限制地国内动员。也就是说,各国政府力量的孱弱是欧洲能够保持多国体系的深层原因。另外,一旦有欧洲国家实施类似于秦国的自强型改革,例如普鲁士和拿破仑法国,那么欧洲的多国体系就会面临支配逻辑的挑战。

结构选择与单元能动

许田波试图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决两大专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大胆的、高风险的尝试。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自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后,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笼罩在结构或体系的强大话语力量之中,单元的能动作用自是不显。在华尔兹的世界中,结构具有自主的反复再生能力,因此,华尔兹的结构世界是静态的,具有一种现状偏好(status-quo bias),缺乏一种转型的逻辑和路径。¹³在这个静态世界中,单元(国家)的作用是被动的,完全受制于结构。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际关系史并不完全支持华尔兹有关国家行为的论断。虽然面对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的限制,但国家仍有采取不同应对战略的自主性。例如,在面临谋霸者时,各大国既可以采取制衡战略,也可以采取诸如疏离(detaching)、跟随(bandwagoning)、搭车(freeriding)、绥靖 appeasing)、隐藏(hid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等其他战略。¹⁴这说明,在结构限制下的国家仍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为此,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单元的能动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因之而兴起。¹⁵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单元的能动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仍然坚持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突破的,他们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对结构性因素视而不见或者理解错误。¹⁶

比较而言,许田波的步子更大一些。她认为单元可以突破结构力量(均势逻辑)的限制,而能不能突破就在于单元本身的能力和战略。历史上不是没有国家打破均势,但它们都不能在通向霸权之路上长期坚持下去,这是因为它们在能力和战略上都存在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路径依赖在单元突破均势逻辑的过程中将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在战略和能力上的初始差别有可能通过某种路径而得到持续地放大和增强，从而不断强化支配逻辑的效用。¹⁷行文至此，我们不禁对华尔兹采取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来模拟国际关系中体系与国家的关系产生一点疑问：微观经济学并未排除某个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最终垄断市场的可能性（假设不存在政府干预），为什么华尔兹在建构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将这一点排除在外呢？

那么，一个能够突破结构限制的国家是如何拥有其能力的呢？这就使我们必须再次转入国家形成问题，考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国家理论研究的老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大致存在三种解释模式：战争、制度变迁和宗教改革。¹⁸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战争中心主义者(bellocentrist)认为，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15至16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越发昂贵，这迫使欧洲各国的君主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动员和汲取更多的资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要比其处于封建式的分裂状态具有更大的规模优势。因此，战争催生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war-making-state)，反过来，新的国家形态又使这些国家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state-making-war)，这种互相加强的过程最终使民族国家模式推广到全欧洲。¹⁹显然，许田波采纳了蒂利的战争中心主义观点。

不过，许田波通过对中国和欧洲改革措施的比较，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多数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家实行的是自强型改革。但是，许田波没有特别深入地分析两种改革的路径差异从何而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体系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制约了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秦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源多来自土地和农民，因此秦国政府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直接管理到农民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最大限度地汲取资源。而在近代早期欧洲，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从短期来看，政府直接向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融资比较容易，更能解决战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要想像秦国那样，建立一套从土地和农民手中直接汲取资源的制度还面临与贵族阶层的博弈，从成本—收益角度

而言,这个办法显得费时费力,成本太高。但金融和贸易集团并不如单个的农民那样容易应付,政府在求助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官职、选举权和税收)。由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实在有限,因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不得不反复求助于他们,这些集团亦借此不断取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种反复博弈过程中,社会力量得以成长,政府和社会达成一种平衡,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立起来,并保证了公民社会和宪政体制的日后发展。

最后,本书留下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有待解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国家开始进行真正的自强型改革,可是其后,不论是拿破仑、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这些谋霸者均功亏一篑,而均势联盟总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说,这些谋霸者实力不成问题的话,那就是谋略出了差错。中国有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到到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尚不得而知。

本书曾获2005年度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Edgar Furniss Book Award)。该奖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默什恩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评出,奖给深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获奖书籍一般是这些学者的第一部著作。以前的获奖者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熟知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²⁰ 获奖这一事实表明,本书的学术水平和作者的学术潜力已经获得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认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的评价是:“许田波可能是仅有的能够驾驭这么复杂的中欧历史比较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中的战略非道德性、残酷性和资源动员方式的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超越欧洲国家。”²¹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学者,许田波的成功或许也为正在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路径的国内学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研究路径:利用中国丰富的本土历史资源,通过比较研究等方式,来推进、完善或证伪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近现代欧洲外交实践当中

提炼出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欧美国际政治的实践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像美欧学者那样方便而娴熟地运用西方的外交材料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外交史料虽然极为丰富，但迄今只有极少数国际关系学者系统地运用这些史料来进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²²除客观的语言条件限制外，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这样一个根植于欧美历史经验的理论能否应用于古代中国抱有疑虑。现在，许田波的成功为国内学者利用本土史料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为国内学者如何才能“扬长避短”提供了一个范例。

最后，我还要对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批国际关系学者所谓“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多国体系”的说法做一点解释。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进行实际治理的中央政府，那么这段时期中国很难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它是否能称得上是一个国际体系，的确值得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前者为人口、土地、政府，后者则增加了主权。因此“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也有的学者(比如本书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已经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了。当然，这只是在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内、一些学者从学理本身的角度得出的看法，²³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常识智慧和民族观念并非同一类问题，因而并不矛盾。

这是一本既难译又易译的学术书籍。说它难译，是因为本书并非一本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专著，而是一本包括国际关系、国家形成以及历史社会学等三个政治学领域的“混合型”专著。书中含有相当数量的不为国际关系学者所熟知的专业名词和术语，以及丰富的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和中国春秋战国典籍材料，这的确显示出作者在政治学诸领域以及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自如穿行的能力，但同时也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作为译者，我经常困惑于某个名词的含义，某个术语的中文对应词，或是某段引文所指。说它易译，是因为本书写得饶有趣味，使翻译变成一个跟

随作者笔锋在中欧历史变幻和时空交错中巡游的过程,所以翻译本书也使译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另外,幸赖作者审阅全文,才避免了许多因译者不才而导致的错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一些来自英语文献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习用的术语并不满意,为此曾和译者就这些词汇如何翻译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比如,国内学界通常将“agency”译为“施动”,但作者认为这个译名极为生僻,后几经协商,最终选择“行为自主性”作为“agency”的译名。“行为自主性”显然比“施动”要更加直观、易懂。

许田波女士对于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非常重视。她数次通读译稿,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这有力地保证了译文的准确与流畅程度。另外,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柴绍锦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生梁雪村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译稿的修订工作,对他们的努力付出我深表谢意!

徐 进

注 释

1.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4. 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在面对霸权挑战时并不一定都采取制衡战略,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预期不完全正确。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pring 1994), pp. 108—148.

5.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6.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 79—99, 178—190.

7. Ibid., pp. 109—149, 190—195.

8. 刘军宁、王焱、贺卫方：《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25 页。

9.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95—205.

10. 在这个问题上，许田波借鉴了查尔斯·蒂利的研究成果。蒂利认为，在近代欧洲，频繁战争迫使各个国家不断改革自己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应付多轮战争对国家资源和能力提出的要求。所以，国际战争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11.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78—190, 216—223.

12. 当然，这只是公民社会和宪政结构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性环境，其精神资源当从文艺复兴带来的罗马法复兴以及欧洲中世纪宪政传统等因素中寻找，但这已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

13. 关于现状偏好，请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1—121.

14.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L.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ummer 1990), pp. 137—168.

15.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及相关著作，可参见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Spring 1998), pp. 144—172.

1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 在这一点上，许田波借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以及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 关于国际系统中系统效应问题的研究。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2000, pp. 507—548; Dougla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ul Pierson,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Daniel H. Nexon, *Sovereignty, Religion and the Fate of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4, pp. 114—115, 151—153.

19.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限于篇幅, 本文无法讨论制度变迁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影响, 有兴趣者可分别参见: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Daniel Philpott,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关于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的介绍和以前的获奖学者, 请参见下述网页链接: mershoncenter.osu.edu/about/furniss/furniss.htm; mershoncenter.osu.edu/about/furniss/previous.htm。

21. al.nd.edu/about-arts-and-letters/news/political-scientist-wins-award-for-first-book。

22. 江忆恩是少有的例外。请参见 Alastair Ia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也有部分中国学者持类似的想法。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阎学通、徐进:《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文版前言

我要把本书的中文版献给恩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他不幸于今年4月29日因患癌症病逝,享年78岁。

多年以来,蒂利一直喜欢让研究生称呼他为 Chuck,我在下文中就沿用这一称呼。Chuck 写作的速度比一般人看书的速度还快,他一生共编撰 51 本著作,发表过 600 篇文章,即使只计算列为经典的论文也甚为可观。这一点在很多讣告中已经提到,我只想在这里表达我对他无限的感谢。我在英文版的致谢中提到,Chuck 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是本书的骨架。我在研究生院二年级时读到他的名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1990]),并深受该书的影响,当时做梦也想不到 Chuck 次年便会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我在三年级时当然不会错过选修他的课程“比较视角中的国家”(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e)。因为我在二年级时已经安排了三位导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和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在三年级时不能再请 Chuck 作为第四位导师。但像 Chuck 这样的大师居然不介意,他与我的正式导师一样深入而直接地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他往往第一个对我的草稿给出评阅意见,有一次仅隔了一夜。Chuck 还经常与我分享与我的论文有关的研究手稿,比如他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合写的《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我

在该书正式出版前数年就已通读手稿，对我的研究方法大有裨益。即使我毕业以后修改博士论文准备出版的时候，Chuck 和其他导师仍然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各种理论问题。有一次，我向他们请教，“萌芽状态的宪政权利”(nascent constitutional rights)一词是否适用于春秋战国，Chuck 耐心地与我讨论不同类型的权利，我最后决定转用“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一词，因为它不含有现代意义上议会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的内涵(参见本书第一章注释 214)。数年后我才得知，Chuck 其实已罹患癌症多年，不时进出医院，病情时好时坏。换了其他人，一定会因病魔缠身而无心工作，Chuck 却在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便加快写作速度，把脑中的想法都写下来传给后人。Chuck，您给我们留下用之不尽的遗产，我们永远怀念您！

借此机会，我也希望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让我可以向更多的海峡两岸的读者介绍我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来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确实不应事事从欧洲中心论来观察世界，本书就坚持不以欧洲经验为典范而中国经验为异常，不盲从国际关系学界的定论而问“为什么均势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失败”。我视春秋战国为一个重要案例，然后再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出现一个强制性的普世帝国，而欧洲却一直保持多国的均势状态。本书的结论是，秦能统一中国，是因为它实施了全面的“自强型改革”，采用各个击破策略和不择手段的计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争霸国相继失败，因为它们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非“自强型改革”。中国在多方面的发展曾经遥遥领先西欧两千多年，不论是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兵法的编写、领土主权的界定，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谈判。不过，中国到后来却被欧洲赶上，甚至一度沦为“东亚病夫”，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汉初儒者对秦始皇深恶痛绝，近世却对他歌功颂德，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以无情手段统一春秋战国体系的秦始皇呢？我希望国内的同僚们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同时，能全面地研究中国传统中的各家各派，而不只局限于儒家学说。我很高兴见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正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更希望国内的同僚们除了研究传统哲学外，还应严肃地检验中国

历史。

当然,本书的中文版能成书,我还必须感谢本书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徐进熟悉国际关系理论,又精通中国古典文献,实在是最佳人选。但我相信他当初答应为我翻译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许多内容那么难译,而作者又有那么多意见,我在此向他表示谢意加歉意。另外,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柴绍锦曾经协助校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生梁雪村将最后的译稿审阅一遍,对他们二人的努力付出,我诚表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圣母大学文科学者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holarship in the Liberal Arts)资助柴绍锦的校对工作。

许田波

2008年5月写于香港